

SHEZHANG SHI
CHUBANSHE DE MINGPIAN

[出版文化丛书·文集系列]



社长是出版社的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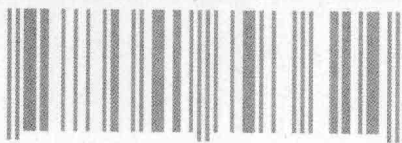
胡守文◎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SHEZHANG SHI
CHUBANSHE DE MINGPIAN

[出版文化丛书·文集系列]



社长是出版社的名片

胡
守
文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长是出版社的名片 / 胡守文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0. 7

(出版文化丛书. 文集系列)

ISBN 978 - 7 - 5068 - 2085 - 1

I. ①社… II. ①胡… III. ①出版工作—中国—文集
IV. ①G239. 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5786 号

责任编辑 / 金 硕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北京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2 (总编室)

(010) 52257154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德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37.75

字 数 / 451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总 主 编 郝振省

副总主编 辛广伟 魏玉山 范 军

执行主编 刘拥军 王 平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平 范 军 刘拥军 孙月沐

肖东发 辛广伟 周百义 郝振省

胡守文 聂震宁 董秀玉 魏玉山

《出版文化丛书·文集系列》 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郝振省

副主任 魏玉山 范 军 刘拥军 王 平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平 范 军 丘 淙 刘兰肖

于秀丽 庞沁文 金 硕 刘拥军

庞 元 武 斌 郝振省 侯仰军

游 翔 魏玉山

一 把出版放在文化的坐标上考察

——“出版文化丛书”总序

出版与文化有着天然的渊源,文化是出版的内容,出版是文化的载体。一方面,出版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作为记载、传播、交流、延续文化成果的主要载体,出版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任,具有鲜明的文化特点。然而,出版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各种非文化因素的影响。当前,伴随着出版物市场繁荣所出现的出版物内容的浮浅、低俗,文化垃圾充斥,出版物流通的虚假推介,严肃学术作品的戏说,文化领域的过度炒作等现象,都是缺乏文化品味的表现,是与文化出版的价值体系相悖的。在这种情况下,倡导“出版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看,出版文化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谱系的重任。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必须具有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才能具有独立的意识。而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基础,是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延续中华文化几千年不断的重要一环,出版文化深刻地涉及中华民族文明运行的方向、方式和气象,赋予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姿态和风采,它左右着人心,凝聚着情感,孕育着精神,教化着后代,把它视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出版业是文化的基础产业和主要传播行业,在文化建设中担当着重要的责任。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更新,出版从产生之日起便是文化的基本载体,担负着传播新知的历史重任。作为一个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的国家,我国出版业的文化积累和传播历来富有重要的文化使命和价值追求。

一部中国出版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史,从文字使用、甲骨钟鼎到活字印刷、网络出版,不断记录、反映了思想文化和科技创新成果的文明历史。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其传承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出版物传播得以实现。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知识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作为知识形态的文化也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文化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文化创新的沃土。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出版文化肩负着引领出版业方向的重任。一个行业在它全面振兴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文化理念有一个系统的而不是片面的、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认识,以建立自己繁荣发展的内在精神支柱和文化动力。作为文化的基础产业,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尤其需要充分地清理出其千头万绪中的历史根源、文化脉络、智慧精髓和精神实质,才能辨析精微地把握“出版系统”的发生学、本体论、结构学和发展动力学。这就是出版文化“认识本我”的工程。因此,全面系统地梳理出版文化与出版理念的源与流,作为出版行业当下的必修课题,是非常适时的。

文化追求是出版业恒久的推动力。倡导“出版文化”研究,目的在于审视出版业的文化价值,提升出版业的文化品位。党的十七大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出发,作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战略部署,发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等部署。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客观上要求文化有一个超常规跨越式的大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出版文化历来是文化建设的基础部分。在当今时代,出版文化作为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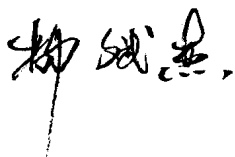
心文化,不但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也记录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进步的运动轨迹。只有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生产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文化精品,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人们对于和谐文化的新期待。这是当代出版业的文化价值标准。为了保证出版文化价值的实现,当前的迫切需要,是构建新的出版文化的评价体系。这对于当代的出版工作者,也许是一种挑战。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挑战,是因为出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生产,内容创意、思想观念、民族原创力、文化价值、社会效益,均需在出版运营中得到充分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与发展中统筹兼顾,继承出版文化的优良传统,改革出版业的生产流通方式,把文化积累与服务大众结合起来。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根本途径,而积极引导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大力推进出版“走出去”、增强文化软实力等一系列新课题,尤其需要一大批既有较高政治觉悟、文化品质,又潜心研究市场规律、熟谙经营之道的复合型人才去研究解决。出版产业化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管理机制与运行机制,提供一个适时适度的制度平台。从这个意义上看,出版文化不只是编辑、策划层面的文本积累、传播的文化,更是一套制度文化、管理文化、企业文化。因此,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编撰的“出版文化丛书”尝试跳出具体的出版实务,从社会政治、历史、思想、经济各个层面来思考出版的内在价值,从“出版文化”层面来探寻出版的发展规律,我认为其立意是高远的,对于出版文化建设以及出版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欣然应允为之作序。

我曾经说过,出版是个“有论无学”和“有学无论”的学科,需要人们去创立。从出版历史、出版实践、出版机构、出版家个人等方面来思考出版文化,是该丛书的基本定位。鉴于国内出版文化研究的相对分

散,该丛书陆续推出5个系列,即出版文化学术系列、出版文化人物系列、出版文化文集系列、出版物文化系列、出版企业文化系列等,计有图书30余种,拟用5年时间陆续推出。其中,既有总论性、概貌性、结构性的学术系列专著,也有出版界人物和机构主题系列专著;既有宏观的、历史的全面考察,也有个案的、横向的比较研究。各系列均着眼于反映出版文化最新研究成果,致力于建构出版文化学学科体系,其学术价值是值得期待的。

《周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又言:“其德刚健而文明。”文明而要刚健,必须有原创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的总纲目和总体精神经过充分深入的原创性研究之后,浮现出来的原理、原则、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只有通过教育体制、传播体制,才能化为全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文化价值取向,成为举世同享的精神成果。对此,出版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是非常重大的。我希望借“出版文化丛书”这样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命题,把古今出版业蓬勃向上的态势放在文化的坐标上考察,反思出版职业的价值,提升文化创新的能力,以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创造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出版业的新辉煌。



2008年8月22日

(作者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

只要愿意学，就一定能够学会。

——列宁

守文同志留念

朴初



一九八二年五一节

1982年，我是在朴老的亲自帮助下安排进京并进入出版社工作的。这是我在十年后向他汇报时，朴老为我写下的寄语。

谨以此书作为向朴老迟到的汇报。——作者

两个勤勤恳恳的好编辑

愿做照亮别人的蜡烛——许岱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里，老编辑许岱同志埋头于一大摞书稿里，那么专心致志，以致于来人问话也毫无觉察。他就是这样在编辑岗位上耕耘了三十个春秋。

许岱生长在歌乐之乡的云南，青年时期就在文工团从事专业创作，写过不少诗歌和小说，后来又从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还写出了两篇短篇小说、评论、书信、诗和通讯报道。许岱完全可以埋头搞创作。然而，他却甘愿默默无闻的图书编辑工作。

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人员仅有十人，每年出书都在三十种左右，作为编辑室副主任的许岱，繁忙的编辑与行政领导工作使他更辛苦、更忙碌。他主持当代文学方面的编辑工作，六年来，编辑、复审、参与初审的书稿达五十四种之多，累计一千三百多万字，平均每年二百多万字以上。

一个时期内，出版古典小说、侦探小说、西方流行小说几乎成为一种风气。许岱认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是要出版那些有益于青年健康成长的书籍。曾有八位青年作者写的两部作品，其中有一部所宣扬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的违背，他毫不犹豫地予以退稿。另一部作品的笔锋尖锐、泼辣，切中时弊，在批评阴暗面的同时仍能显示出光明，给人以鼓舞。许岱态度鲜明，肯定前一部，支持出版后一部。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后来被他肯定的那部，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而被肯定了的那部，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奖。

他看到一部有修改基础的小说稿，总是怀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逐章逐节地琢磨，逐句逐字地推敲。最近，他从来稿中发现一部长达四十余万言的历史小说，作者是一位普通的青年人。许岱从书稿中，看出了青年作者在史料运用、艺术构思、文字表达方面有一定的功力。他怀着极大的热心，把作者从四川请来，一起谈修改方案。修改稿完成后，许岱立即投入编辑工作，不辞辛苦，字斟句酌，反复斟酌。

许岱对于修改工程比较大的稿件，力争作出准确的判断，既不开玩笑提出过高的要求，也不轻易地简单否定，而是诚恳地、坦率地把自已的意见提供给作者，调动作者的积极性。对于有的青年作家在作品中渗入的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他总是耐心地

说服他们去修改。

对于作家，无论是名家，还是新秀，他总是坚持从书稿的质量出发，从培养文学新人出发，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出发，做到一视同仁。著名作家峻青同志从“四人帮”的桎梏中走出来后，抱病由沪来京撰写长篇小说《海啸》。许岱深知他健康欠佳，在创作过程中，尽心竭力地当好参谋和助手，峻青同志受到不少启发，顺利地完成了创作任务。青年作者叶辛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浪里》、《蹉跎岁月》三部长篇小说，都是许岱最后定稿的。他对叶辛同志的书稿要求很严，要他一部比一部写得好，一部比一部有价值。

许岱编辑工作经验丰富，专业知识比较全面。为了编好四卷本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他参阅了四十多种版本，保证了质量。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好评，两年多的时间内再版四次。从一九八一年开始，每年由他编一本《青年诗选》。每集收入五十名青年诗人的二百多首诗歌，从约请有关单位推荐诗人诗作，到编辑人选，从撰写诗人小传，到发稿编辑等，几乎相当于一个编辑组的工作量，都由许岱一人承担。

许岱在编辑室事无巨细，任劳任怨。论年纪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是每次劳动，他都同大家一起去干。他患有哮喘病，但每年都出外约稿。对于新到编辑室的青年同志，他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看稿、改稿、写书读报告。

他的意愿是：一辈子甘为他人作嫁衣裳。

编辑队伍中的年轻人——胡守文

一九八三年四月，正当全国掀起学习张海迪热潮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及时地出了一本反映张海迪事迹的书——《闪光的生活道路》。这本书短短的三个月内共印行五百零九万册，紧接着该书又相继出版了《张海迪书信日记选》和《闪光的生活道路》（续编）。这三本书分别被团中央和一些省市、自治区选为开展读书活动的推荐书，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三本书的责任编辑是一位到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不到一年的青年人——胡守文同志。

胡守文一九八二年九月由山西大学哲学系毕业，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一年的时间内，先后发稿四种，其中三种已经出书。他目前正在审稿、组稿和联系的书稿还有十五部之多。

去年二月初，编辑室了解到团中央计划在全国宣传张海迪先进事迹，决定从出书上积极地加以配合。胡守文接到这一任务后，大年初四，春节假期还没有结束，就踏上了去山东的路途。到山东后，他抓紧时间向有关方面做了深入的了解，及时向领导作了汇报。从山东回来后，他就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精心选择文章、书信、日记和照片，在短时间内编出了一本较好地反映张海迪事迹的书，在出版部门配合下，这本书很快出版发行，配合了全国的学习高潮。

在编写《闪光的生活道路》之后，胡守文投入了《张海迪书信日记选》一书的编辑工作。他第二次去山东，从张海迪家中数尺厚的成堆中，搜集到她多年来留存近百封信件底稿，并千方百计求得张海迪家人和朋友的支持，经过细心阅读和认真整理，在一个月里编出了《张海迪书信日记选》一书。这本书只经过三个月就出版了，印数达八十万册，其速度之快，使张海迪本人也感到惊奇。

胡守文善于思考。他在参与了解张海迪先进事迹和宣传张海迪的工作中，对如何正确地宣传典型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就怎样看待典型、青年需要什么样的典型、我们怎样宣传典型、宣传典型应注意的问题等，写出了一篇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的论文。这篇论文被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选中，提交给在烟台召开的全国出版研究年会，他本人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年会。

胡守文在工作中不怕困难，勇于接受任务并在实践中学习。例如，他在接受了编辑报告文学专著《祖国在我心中》一书的任务后，阅读了大量报刊杂志。他提出编这本书所写的爱国人物不必局限于青年，中、老年的爱国人物对青年也一样有教育意义。这一想法，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又如：当领导把青年业余生活的通讯选交给他制定时，虽然这一工作难度较大，他过去也没有接触过此类书稿选编，但还是大胆接受了任务。他一方面自己动脑筋，另一方面向老同志请教，学习，终于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胡守文作风朴实、谦逊，善于团结同志，虚心向老编辑学习。这一点，不仅编辑室的同志，和他有过工作接触的外单位同志和作者，都深有体会。他去年参加团中央赴山东学习宣传张海迪工作小组，工作结束后，团中央宣传部领导向出版社提出表扬胡守文同志。

（中国青年出版社供稿）

这篇报道，原是发在中宣部的内部简报上，后被《光明日报》于1984年元月31日转载。

“好编辑”和“社长”，这其中自有某种联系，但我对前者的称谓更喜欢些，因为它是职业成就的标志，而“社长”却不一定是……

— 一张别开生面的名片

——《社长是出版社的名片》序

守文喜爱自己的命题：“社长是出版社的‘名片’。”他以此为题写作的应征文章得过奖励。如今他又用来做自己文集的书名。我觉得，这本记录了出版路上不断追问的文集，倒称得上是守文的一张别开生面的名片。

守文在出版界，包括香港和台湾出版界，有相当的知名度。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界陆续出现一批活跃分子。他们勇立潮头，锐意进取，逐渐成为出版界的中坚。守文是他们之中的代表之一。守文主持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业绩和这四十多万字的文章足以证明。

守文自称“我是传统的卫道士，又是新事物的接生婆”。这话在自谦之中带有几分调侃。

其实，守文不是“传统的卫道士”。他坚持和捍卫的是，出版活动中的文化理想、文化追求。而这正是出版的宗旨，出版的本质，是基本的出版理念。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对出版的核心要求。基本的出版理念，难道不值得坚持和捍卫吗？

守文说：“出版是什么？是人类思维的复制化过程，也是一种特定的思想表现手段。”明明白白，基点是思想，是文化。守文回顾中青社的历史，基点就是思想和文化。他说中青社“是一个用自己的出版物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文化出版单位”。“一批皇皇巨著”，成为“共和国文化宝库中耳熟能详的经典”。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中青社在思想文化建设当中的重大贡献，而不是别的什么。守文展望中青社的未来，基点仍然是思想和文化。他提出，要确定中青社图书出版的“三境界”：第一层是“多出好书”，第二层是“多出精品”，第三层是“多出标志性读物”。

“基础的出版物应是好书，中间是精品书，塔尖是标志性读物”。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中青社应当在思想文化建设当中做出新的重大贡献，而不是别的什么。他真是一以贯之。

守文这个“卫道士”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可是他决不泥古不化、固执保守。恰恰相反，他对新事物非常敏感，非常热情。所以，他又说自己是“新事物的接生婆”。值得称道的是，守文这个热情的“接生婆”头脑非常清醒。一方面，他积极支持推动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新事物。另一方面，他努力探寻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坚持基本出版理念。在新事物不断涌现的大潮中，他坚持的基本出版理念得到了展开、充实、实践和印证。

新事物之一，市场经济。问题的提出，守文说：“自20年前出版改革始，文化理念怎样在经济大潮面前确立和发展的的问题又被频频提出，这是出版这一智慧产业的‘牛鼻子’。”问题的回答，守文说：“文化和商务结合，这是一个崇高的赞美。”守文满腔热情地欢迎新的出版儒商。他说：“中国出版人在行业的迅疾发展中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强劲洗礼，……一茬茬普通的出版人已然成长为长袖善舞的新一代儒商，在残酷的商战搏击中，处处闪射出智慧和才情的光芒。”守文对新的出版儒商的热情欢迎，就是对出版改革和发展的热情欢迎，就是对出版业新事物的热情欢迎。当然，守文没有忘记基本出版理念。守文说：“与他们以前相比较，新出版业的儒商更多的是从社会历史责任上着眼。”他特别强调，“问题的核心”是“作为文化企业，在编辑和出版实践中，应如何在推动市场的同时，坚守自身的历史使命和道德责任，如何成为一名有历史担当的出版‘儒商’。”守文的这份清醒，与那种对利润的迷信相比较，高下立判。

出版业不能没有利润。利润很重要。但是，利润不是出版的最终目的。出版的最终目的是多出好书，是建设文化。让我们看看守文的一个例子。中青社1998年提出全社经营重点由书向刊转移。刊物的发展带

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守文说：“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刊带书’的可能性。”“在整个出版管理中，我们可以完全革新这十多年来在出版行业盛行的所谓激励机制，将它的坐标系由人均创利提成改变为好书标准的确定和选题论证决策机制的完善。”“将编辑从经济指标的压力下彻底解放出来，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自由发挥、创造地出好书的舞台。”“抓社刊的目的，最终是书刊一体互动，是整个社的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守文把这个行动称之为“解放生产力”。这个评价不为过分。我不是要推广守文的具体做法。经验照搬是行不通的。我欣赏的是守文的改革思路。这个思路就是，用经济手段有效推动多出好书。经济手段，指的是坚持以多出好书为导向的经济活动的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理想境界是利润增长和多出好书的良性互动。

新事物之二，网络传播。守文说：“我们提出了现代出版与传统出版这一重大而迫切的研究课题。”他把由网络技术带来的新兴传播形式称为现代出版，以别于传统出版。他说：“现代出版不期而至，使传统出版业直接面对高科技的挑战，甚至出现了现代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传统出版功能的趋势。”“在高科技的介入和带领下，我国出版业的实践也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他不仅满腔热情地欢迎出版方式的革命性的变化，而且提出了编辑出版理念随之转换的任务。他说：“现代出版的横空出世，标志着出版业在观照以往出版历史中，显示出编辑制作发行及产品形态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甚至对一系列编辑出版理念提出了挑战。”他还一一指出转换的要求。当然，守文没有忘记坚持基本出版理念。在论及现代出版的追求时，守文说：“我们的出版行为要雁过留声，在若干年后，要留给后人一个资源宝库。”网络出版——现代出版，也要坚持文化理想、文化追求。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守文指的显然不是财富，而是文化——优秀文化的传播和积累。

如今在网络传播中，红得发紫的是网络游戏，上下内外，一片叫好。为什么？因为网络游戏的产值已经直逼图书出版。这就功德圆满

了吗？未必。请问，那些大赚其钱的网络游戏是什么内容？为什么那么多家长和老师为网络游戏的害处忧心如焚？我们发展网络传播难道是为了让出版的文化品位下滑吗？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守文的提醒决不是多余的。

新事物之三，走向世界。中国出版走向世界，大势所趋。守文为此多次到境外、国外发表演说，奔走呼号。守文不是停留在贸易层面，而是上升到文化层面。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世界性语言’来表达中国文化呢？……寻找中西文化的契合点，在对外合作过程中，既讲‘汉语’，又讲‘世界语’。”他提出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远大目标：让东方文化“在世界上与西方文化比肩而立，让东方文化闪射出惠泽世界的独特光芒”。他说：“东亚工业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腾飞，造成了两种文明对比中的平等趋向，从而有了一种可能，即东亚文明可以冲出地域界限，为人类共享以及东西方互相交流、接近，从而在这一新的结合点上产生世界性的选题。”这将是“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一个不可更移的趋势”。总之，中国出版走向世界不只是贸易走向世界，更重要的是文化走向世界。重要的是文化的内容，文化的优劣，文化的影响，文化的交流，而不只是贸易额的顺差和逆差。

问题来了。中国出版拿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我们能够总是拿中国的古代文化去应对人家的现代文化吗？让中国人自豪的当代中国文化在哪里？中国出版有哪些代表当代中国文化的标志性出版物？中国出版为建设当代中国文化所作的努力够了吗？中国出版面对上述根本要求完全觉醒了吗？莫忘了，中国出版要为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竭尽全力。这是出版的基本功能，出版的社会责任，出版的国家义务，出版的职业操守，出版生存发展的基石，出版生龙活虎的灵魂。

什么是当代中国文化？它无愧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优良传统，它无愧于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博大胸怀，它无愧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的辉煌成就，它无愧于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渴望。只有这样，中国出版才能满怀信心地说，无论走出去还是引进来，我们都敢于交流，敢于竞争。面对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我们能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只有这样，中国出版才能毫无愧色地说，我们为之献身的当代中国文化，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话说远了。回到这本文集。我的议论挂一漏万。守文视野开阔，思维敏捷，既能旗帜鲜明，又能与时俱进，既能高瞻远瞩，又能细致入微，有宏观，有微观，有务虚，有务实，洋洋洒洒，目不暇给。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贯穿首尾的红线是，出版以传播和积累优秀文化为己任。我相信这个道理。如果出版没有文化的理想和追求，国家和人民还需要出版吗？

守文豪情满怀地说：“出版英雄，这应是新一代出版儒商的本色。”

我也期望出版界英雄辈出。出版英雄，必定经由文化理想和商业智慧的高超结合，舍此别无他途。

守文这本文集，“以‘追问’篇开始，以‘路之谣’篇结尾”。追问，锲而不舍；路遥，坚信未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看见出版人胡守文，志存高远，奋力前行。

刘 杲

2009-11-26于北京

- 写在前面的话

整理完这部书稿,我为这本书的书名踌躇再三: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长,我已卸任。十一年的历史已经像书页一样翻过去了,再张扬地在书名中出现“社长”二字,甚至要讲的是社长的“名片效应”,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然而,最后我还是决定采用了现在这个书名。这原本是我写于2002年的一篇应征文章的题目。当时,我还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任上。这篇文章获了行业内征文一等奖。“社长是出版社的名片”的说法,据称赢得了评委和业内的赞同。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说法,已然脱离了自身的心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远离了对特定对象的自我评价,而成为出版行业内对诸多“一把手”的共同的期冀和要求。

这个要求蛮高的。很惭愧,在我,并没有做好。

翻检十一年的风雨来路,我不禁想起台湾漫画家几米在其作品中表现的一幅画:我的优点和缺点是不是刚刚好一半对一半?遥想当年,毛泽东说能对自己三七开就满意了;小平同志又比喻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一抓一大把。我常常觉得,这只不过是领袖式的谦虚和幽默。他们尽管这样说去,其实并不能丝毫泯灭他们在我心中的光辉。今天,不期然轮到需要认真作一个自我总结了,才觉得这实在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在中青社工作的二十六年中,我先后担任了二十三年社级领导,其中包括十一年的“一把手”,基本参与和见证了这个出版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飞速发展历程。这是一个用自己的出版物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文化出版单位。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牛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人